

从《观古堂藏书目》看叶德辉的编目学

(新加坡) 沈俊平

一

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也作焕彬),号直山,一号郎园。先世乃江苏吴县人。清咸丰中,太平军进至江苏时,其父叶肇浚举家迁居长沙,叶德辉后捐得湘潭县籍,遂为湘潭县人。光绪六年(1880)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十一年(1885)中举人。十八年成进士,授吏部主事。次年回湘,不复出。时王先谦标榜“以提倡经学为己任”,他与王投契,研讨经学,以“决事明快”受到器重,遇事被邀入议,遂在地方绅士中渐露头角。湖南维新变法期间,因其竭力攻击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倡导变法,得到保守人物称赞,一时声名大噪。宣统二年(1910),他乘本省灾荒严重,积谷万石,不肯减价出售。长沙抢米风潮发生后,他被革去功名。民国四年(1915),在湖南组织筹安分会,担任会长,拥戴袁世凯复辟帝制。平日横行乡里,鱼肉乡民。破坏北伐和工农运动,在1927年大革命中被杀。^①

叶德辉虽在政治上表现得比较保守,在地方上的行为亦极为恶劣,但在学术上却颇有成就。作为一个学者,叶德辉长于经学、文字学、史学、版本目录校勘学。著有《书林清话》、《书林余话》、《观古堂藏书目》、《郎园读书志》、《藏书十约》、《六书古微》等等。

二

《观古堂藏书目》(简称《观目》)是叶德辉的藏书目录。观古堂是叶德辉之室名及其藏书楼之名,在长沙洪家井寓宅内。清季末世,叠更丧乱。江浙文物之会,图籍荡佚,板刻多毁,印本渐稀。叶德辉“竭四十年心力,凡四部要籍无不搜罗宏富,充栋连櫔”^②。据其儿子叶启倬、叶启慕在《观古堂藏书目跋》之描述,叶德辉日以搜访书籍为乐,每岁归来,家中必当增添多櫔之新刻旧本,往往检视弥月仍不能罄工。叶德辉好书成癖,即使在流离颠沛之中,仍不改其常度。^③至辛亥时,插架已达卷十六万有奇,以重刻计之,二十万卷之外。^④后十余年又有扩张,据估计其藏书至其在1927年遇害止可能已超过三十万卷。^⑤以此巨数,在当时藏书家即属不易,亦为翘楚。

光绪辛丑、壬寅年间,即光绪二十七八年间(1901—1902),叶德辉即已着手为其丰富的藏书编订藏书目录。辛亥革命期间,叶德辉避居湘潭朱亭山中时,将之予以重编;尔后因续有收藏,因而陆续修正,于民国五年(1916)付刊。其编印之原委,分见于以下两篇文献。《观古堂藏书目序》说:

辛亥鼎革避乱县南朱亭乡中,重编此目,以志一生精力之所在,分类与四库不同,具详凡例。儿子启恭、启倬请以活字排列,分贻诸从兄弟。余为缕述先世家学及生平所历之境,他日如有好事,仿菟翁年谱,逐日为余记其所藏,则余别有题跋诸书在,可以取证也。^⑥

此外,《观古堂藏书目跋》对其编印之原委,有更详细的解说。叶德辉之子叶启倬、叶启慕说:

《观古堂藏书目》四卷,家大人编于光绪辛丑壬寅间。部类粗定,每为启倬等言:目录之学,分类至难,吾之为此,聊以记录,不可示人也。迨辛亥避乱邑之朱亭,因携此目重为编订。亦

谓兵燹之后，书亦散亡，书亡而目存，亦聊作前尘梦影而已；不谓乱后书得幸存，而此目稿已数次更写，盖今距辛亥又及六年。中更兵事，逮逃南北，奔走京都、上海，书客如鳞。家君每岁归来，必有新刻旧本书多橱，充斥廊庑间，检之弥月不能罄。平生好书之癖，虽流离颠沛，固不易其常度也。家君平日遇宋元明钞旧本，多手自勘定，题跋精详，曾编《郎园藏书题跋记》四卷，启俾缮录成帙，并拟付刊。故此目于一切宋元刻本、名校旧抄，大半载而未尽，然明以来精刻善本则详录靡遗。家君恒言，此目可以补正张文襄《书目答问》之缺误，亦足备《清史·艺文志》之史材。^⑦

通过以上两则文献，知道叶德辉编印《观目》的动机有四：一为“志一生精力之所在”，二为“缕述先世家学及生平所历之境”，三为提供版本资料，四为纠正鉴别观念之偏差。

《观目》全书凡四卷，卷一经部、卷二史部、卷三子部、卷四集部，采传统的四部分类方式，与《四库全书总目》、张之洞《书目答问》大同小异。共计著录藏书五千一百四十八种、六千八百零三部、十一万一千五百零一卷。该书目“于一切宋元刻本、名校旧抄，大半载而未尽，然明以来精刻善本则详录靡遗。”叶德辉对此书目的期许很高，以为“此目可以补正张文襄《书目答问》之缺误，亦足备《清史·艺文志》之史材”。

《观目》分四部四十五类，其中二十九类又各析若干子目；不再区分之十六类，或从撰人时代叙次为一类，或依从学术内涵、性质独立为一类；诸家书目有分类欠妥者，则加以考核校正。

三

体例一事，决定一书之写作方向、价值与特色。中国目录书的体例，在其意义与功能上，都迥异于西方之目录。^⑧ 昌彼得《中国目录学》一书中，详言中国目录书的体制如下：

刘氏向、歆父子的《别录》、《七略》，是后世编著目录者所取法的，故评论目录书的优劣，不能不拿《录》、《略》作为衡量的标准。综括《录》、《略》著作的体例，主要有三项：一曰篇目，是概括一书的本末；二曰叙录，是考述作者的行事，与论析一书的大旨及得失；三曰小序，是叙述一家一派的学术源流。所有这几种体制，其作用即是章学诚所谓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后代的目录书，无论内容或详或略，或损或益，大抵不出这三个范围。自从雕版印刷术普及后，宋以来的目录书中间有记载版本的。清乾嘉以来，版本之学兴盛，各家藏书目录的编撰，大多详记版刻的源流，则所以考版本的源流异同。这种体制虽然属于后起，但已为近世研治目录学者奉为圭臬。以上四种体制，如有不备，则目录的功用不全。^⑨

昌彼得这段话，已将目录书的体制，解析甚详。由于后代目录繁多，在体例上多少互有不同，因此研究一部目录时，其著录体例乃成为必要之研究范围。今乃就叶德辉《观古堂藏书目》中的著录情形，加以分析，以归纳其著录之体例。

一、各书皆首冠书名，次卷数，下以小字双行著录撰人姓氏，及所藏各种版本。如：

《逸周书》十卷 晋孔晁撰一明吴琯《古今逸史》刻本、一明程荣《汉魏丛书》本、一明何允中《汉魏丛书》本、一乾隆丙午卢文弨刻《抱经堂丛书》本、一王谟《汉魏丛书》本。

偶有附注其他事项，如：

《山谷外集》十四卷《别集》二十卷 宋黄庭坚撰明万历甲寅李友梅刻本，按据李序乃因方沆刻《正集》补刻此《二集》，然《正集》半叶十行，行二十字，此刻十一行，行二十字，不知行格如何未划一。

二、各书依经、史、子、集四部排列。经部凡十四类、史部凡十二类、子部凡十四类、集部凡六类。

三、各目之下依著者时代先后排列。

《观目》除了以上三点一般性的体例外，在其小注中，尚有许多附加著录，此乃构成《观目》的特色，故一一分述于下：

（一）“通”例的著录

明代藏书兼目录学家祁承燾在《庚申整书例略》中提到他编目时所用的四个方法，其中有“通”例曰：

通者，流通于四部之内也。……古人解经，存者十一，如欧阳公之《易童子问》、王荆公之《卦名牌》、曾南丰之《洪范传》，皆有别本，而今仅见于文集之中。惟各摘其目，列之本类，使穷经者知所考求，此皆因以少以会多也。又如《靖康传信录》、《建炎时政记》，此杂史也，而载于李忠定之《奏议》；《宋朝祖宗事实及法制人物》，此记传也，而收入朱晦翁之《语录》；如罗延平之《集》，而《尊尧录》则史矣；张九韶之《集》，而《传心录》则子矣。凡若此类今皆悉为分载，特注明原在某书之内，以便检阅，是亦收藏家一捷法也。^⑩

祁承燾此意，乃是将文集或丛书之中，原应属于各类的单本著述，一一从原集或丛书中析出，分别著录于所当入的各类，再于其下注明原属于某集或某书，以便即类求书。叶德辉在《观目》中，大量地采用了祁承燾的“通”例，如《子夏易传》一卷，下注：

一道光辛巳张澍辑刻《二酉堂丛书》本、一马国翰辑刻《玉函山房丛书》本。^⑪

又如《独断》二卷，下注：

一明重刻《百川学海》本、一明《古今逸史》本、一明程荣《汉魏丛书》本、一明何允中《汉魏丛书》本、一王謨《汉魏丛书》本、一乾隆庚戌卢文弨刻《抱经堂丛书》本、一咸丰二年杨以增海源阁仿宋刻《蔡中郎外集》第四卷本。^⑫

就整体来说，叶德辉的这个方法仅用于属于汇刻丛书上。汇刻丛书往往包罗古今书籍，内容非常庞杂，所牵涉的范围包括经、史、子、集各方面的书籍。因此，叶德辉将这些汇刻丛书下的单本著述一一

析分出来，按其内容归类。

（二）版本之著录

叶德辉《观目》中有版本之著录，且非常详备，其例如下：

《旧唐书经籍志》二卷 晋刘曜等撰日本刻八史经籍志本

《沈文肃政书》七卷 沈保楨撰 光绪庚辰活字排印本

《代北姓谱》一卷 周春撰 抄本

《高忠宪年谱》二卷 明高攀龙子世宁撰 顺治己亥家刻本

《仪礼石经校勘记》四卷 阮元撰一乾隆乙卯《文选楼丛书》本、一咸丰乙卯《粤雅堂丛书》本、一光绪庚寅成都书局《石经汇函》本

在《观目》所著录的各时代的版本中，我们发现以明清时代的刻本居多。叶德辉在搜求图书时有偏嗜明清刻本的倾向，对时人想尽各种方法、途径追求的宋元旧刻的兴趣不大，这多少反映了旧刻愈远愈稀的现象，但主要与叶德辉学术思想息息相关。叶德辉这种偏嗜明清刻本的倾向也强烈地反映在其目录学上，从《观目》的版本著录中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倾向。叶德辉重视著录明清刻本的目录学观点，在清代目录学中尚属“异类”。我们可以通过叶德辉以下的一段话了解清代目录学界在编制书目时著录图书版本的倾向：

自来藏书家目侈录宋本，此则元旧钞，明刻又次之，至于近刻则屏而不录，此洪北江所谓藏书者之目也。阳湖孙氏《祠堂书目》间诸时刻，略而不详，然其目分十二类，通《汉略》《隋志》之邮，变《崇文》《文渊》之例。近著述读者不仅以书目重之，道光中有倪氏《江上云林阁书目》，中依《四库》分类，多收时刻，间有一二宋元明钞，洪北江为作藏书记，亟称誉焉。同治中揭阳丁禹生中臣日昌开府，江南兵燹之余，旧家藏书悉为捆载归田，后刻《持静载书目》，亦遵《四库》，分别宋元明刻旧钞，兼载近刻，此洪北江所谓读书者之藏书也。自兹以后，如聊城杨致堂河师以增《海源阁书目》、常熟瞿子雍明经鏞《铁琴铜剑楼

书目》、归安陆诚斋观察心源《皕宋楼书目》、闽县陈征芝大令兰邻《带经堂书目》，皆以宋元旧刻旧钞孤本秘笈相矜尚，体例与倪丁二目不同，见者钦其宝。莫名其妙，可谓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者也。^⑬

通过以上的一段话，说明清代除少数书目编制者在书目中著录时刻外，一般书目编制者都有偏重著录宋元刻本、名校旧抄的倾向。叶德辉对于这种“非读书者之藏书”不以为然，对收录近刻、时刻的《江上云林阁书目》、《持静载书目》等，以为乃“读书者之藏书”，给予它们极高的评价。

（三）卷目之著录

一书内容较为庞杂，各卷所叙内容不相贯联者，叶德辉便将书之卷目，著录于其下，如《袁中郎十集》十六卷，下注：

《广庄》一卷、《敝篋集》二卷、《桃源咏》一卷、《华嵩游草》二卷、《瓶史》一卷、《觴政》一卷、《破研斋集》三卷、《广陵集》一卷、《狂言》二卷、《狂言别集》二卷。^⑭

又如《吕新吾全集》四十九卷，下注：

《奏疏》二卷、《忧危》一卷、《公牒》一卷、《去伪斋文集》十卷、《交泰韵》一卷、《四礼翼》八卷、《四礼疑》五卷、《小儿语》一卷、《河工书》一卷、《长城或问》一卷、《疹科》一卷、《无如》一卷、《天目书》一卷、《阴符注》一卷、《训世格言》一卷、《宗约哥好人哥》一卷、《闺训》一卷、《实政录》七卷、《省心记》一卷、《反挽歌》一卷、《墓志铭》一卷、《附录》一卷。^⑮

（四）丛书子目之著录

谢国桢在《丛书刊刻源流考》一文中指出丛书的内容“约可分为六类：一曰汇刻（即古今著述），二曰类刻，亦可名曰专刊（即经、史、子、集诸部），三曰辨伪辑佚，四曰自著，五曰郡邑，六曰族姓。此六类者，系指昔日所刻丛书而言”。^⑯《观目》中对丛书子目的著录有其一套法则，就类刻来说，由于所收录的图书基本上属同一内

容，不涉及其他范围，所以叶德辉在处理这些丛书时基本上是将这些丛书收录的细目列在丛书之下，如《天学初函器编》三十卷列其十种细目、《勿庵历算全书》七十四卷列其细目二十九种、《数学五书》五卷列其五种细目、《国朝十家诗钞》七十五卷列其十种细目、《国朝百名家诗钞》丙、丁、戊、己、庚五集五十九家列其五十九种细目、《宋六十名家词》八十八卷列其六十一一种细目、《宋元三十一家词》三十一卷列其三十一一种细目、《宋元名家词》十五卷列其十五种细目、《元人百种曲》一百卷列其一百种细目、《玉茗堂四梦传奇》八卷列其四种细目等等。

（五）按语之著录

叶德辉在《观目》中往往于小注内加入按语，一般是放置在版本项之后。其按语之内容颇为庞杂。有些按语是用来说明与前人书目之归类不同的原因，如“史部·注历类”之唐李德裕编《次柳氏旧闻》一卷，下有按语云：

按此即《明皇十七事》，《四库》入小说，然德裕序明言信而有征，可为实录，则故史部之流，今故移入此类。^{①7}

叶德辉在这里说明将《次柳氏旧闻》一卷归入“史部·注历类”，而不像《总目》将之归入“子部·小说类”，是由于其可信度高，可为实录的缘故。又如“史部·别史类”之宋李心传撰《道命录》十卷，下有按语云：

按此书《四库提要》入传记名人之属，存目。今按其书乃纪庆元党祸诸事，而以赵忠定朱子为道统，所属其事特详，故名之曰《道命录》。然纪一人之事则生卒始末不详，纪诸人之事则里贯仕籍不具，论其体要与《庆元党禁》记党事首尾者相同，盖史家杂史之属。《四库》并《庆元党禁》入传记，非也。^{①8}

又如“史部·别史类”之明程敏政撰《南宋遗民录》十五卷，下有按语云：

按此书虽分人纪事而始末不详，《四库》入传记，存目，非

也。^⑮

叶德辉以“纪一人之事则生卒始末不详，纪诸人之事则里贯仕籍不具”，将《道命录》和《南宋遗民录》并入“史部·别史类”。再如“史部·杂史类”之宋孙升撰《孙公谈圃》三卷，下有按语云：

按此书多记北宋诸臣遗闻佚事，实为史部之学，《四库》列入小说，非也。^⑯

叶德辉在这里以“此书多记北宋诸臣遗闻佚事”，当为“史部之学”，认为《总目》将它列入“小说类”为错误的做法。

除了在按语中说明分类的原由外，其用按语交待的事项颇为复杂。如“史部·杂史类”之明吕毖校《明宫史五史》，下有按语云：“此即《酌中志》之十六卷至二十三卷，为明内监刘若愚撰，吕毖校正，故题其名。”^⑰此按语说明《明宫史五史》实摘录自《酌中志》之十六卷至二十三卷，同时也说明其得名由来。又如“史部·杂史类”之明刘若愚撰《酌中志余》二卷，下有按语云：“此皆《酌中志》、《明宫史》未载之事。”^⑱说明《酌中志余》有异于《酌中志》和《明宫史》。又如“子部·数术类”之戴煦撰《求表捷术》九卷，下有按语云：“按《对数简法》在内。”^⑲说明《求表捷术》内包括《对数简法》这本书。再如康熙二十二年奉敕编《钦定万年书》十二卷，下有按语云：“按《四库》未收。”说明《总目》未收此书。由于《观目》之按语颇为庞杂，无法一一指陈，故仅举以上几个例子。

四

上文曾引昌彼得之言，谓目录书著录的体例有四：篇目、叙录、小序及版本。这里拟以此四项体例作为标准，对《观目》作一讨论，以研析《观目》于此四种体例，是否完备。

（一）篇目

篇目的体例是条别全书，注明某篇第几。篇目的作用，是概括一书之本末，使读者一览目录，即能了然全书首尾，而后阅书，即可

知其残缺与否。^{②4}

篇目的体例在卷册未行之前，是非常重要的。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一书说：

古之经典，书于简策，而编之以韦若丝，名之为篇。简策厚重，不能过多，一书既分为若干篇，则各为之名，题之篇旨，以为识别。其用特以便检察，如今本之题书根耳。^{②5}

到了后代，书籍的形式渐由简策变为卷轴，更演进为书册，易藏易检，也无单篇别行之必要。且后世的书卷帙繁多，若撰书目时，一一列举篇目，似无意义，因此篇目的体例就渐渐消失了。但如因篇目繁多就删除不载，后人又无从考覆存佚，亦为一失。前文详言《观目》中小注的第三项，乃将一书之卷目著录下来，这正是对篇目体例的改进和简化。昌彼得曾说：

这种的叙述方式，于卷幅无所增，虽未列篇目，而对于一书的始末仍可显见，后世即令有亡篇佚卷，犹可据以检覆，于例最为得之，是编著目录者所应当师法的。^{②6}

《观目》中除对一般书籍作卷目的著录外，对于丛书子目，亦纷纷著录于丛书之下，这可说是“篇目”的又一扩大。丛书中收入各种内容庞杂的书，如不一一著录子目，则阅者于其内容无从知晓，故《观目》中著录丛书之子目，可说是大大发挥了篇目体例的功能，是叶德辉在编目学上的一项成就。

（二）叙录

叙录体例的要点，在考述作者的行事，与论析一书的大旨及得失。而刘向撰写叙录的义例有三：一为介绍著者的生平，二为说明著书的原委，三为评论书之得失。^{②7}

以此三项义例来衡量前文中《观目》的体例，则《观目》中可说没有叙录的体例。

但叶德辉的另一部目录学著作——《郎园读书志》的性质是读书题跋，和陆心源《仪顾堂题跋》、《续跋》，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跋

记》、《续记》，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等书性质一样。他择取藏书中较有特色、价值的，进行考订的工作，撰写跋文。这些日积月累的跋文，后来在子侄们的共同努力编辑下，成《郎园读书志》一书。

（三）小序

小序的作用，是条别学术的源流与得失。刘歆在编辑《七略》时，“叙述各家各派学术的源流及利弊，合为一篇，放置目录之前，谓之辑略”。后班固著《汉书》时，便“将辑略一篇文字，解散分载于各类书目之后，作为小序”^②。《观目》中对小序这项体制，亦付之阙如。小序的体制，可见于《观目》的四则〈凡例〉。这四则〈凡例〉分别置于四部之前。因此，这四则〈凡例〉的功用，除了说明其著录与分隶门类的义例，于学术的流变亦有所发明。《观目》的这种做法，显然和《总目》不同。据《总目》卷首〈凡例〉云：

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按三应作四）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③

和《总目》比较起来，《观目》无总序，于各类之前亦无小序。《观目》的小序做法，是通过简单扼要的文字把各类目的学术流变勾画出来，合并起来，成每部类之前的〈凡例〉。文字虽精简，但我们不可忽视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价值。

（四）版本

前文的讨论中我们知道《观目》对所藏版本之著录特别重视，且特别注重明清版本的著录，颠覆了明末以来目录书重视著录宋元旧槧的做法，叶德辉在《观目》的这种做法，在清代目录学史上可以说是颇为前卫的。

五

综合以上的讨论，发现《观目》在体例上，有不少继承与创新的

地方。它将刘向《别录》中“篇目”的体例简化为“卷目”的著录；对刘歆《七略》中的“小序”亦有所简化；扩大尤袤《遂初堂书目》中版本的体例；继承祁承炏“通”例，解决了图书分类的问题。

《观目》虽欠缺了“叙录”一项，然其他三项体例仍颇为完备（虽然其中已有所变化）。因此，目录学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在《观目》中仍可以得到发挥，这是《观目》在编目学上的一项成就，故叶德辉的编目学是值得我们发扬和效法的。

注：

①有关叶德辉详细的生平，可参阅杜迈之、张承宗：《叶德辉评传》（长沙：岳麓书社，1986）。

②刘肇隅：《〈郎园读书志〉序》，见叶德辉《郎园读书志》，简称《郎志》（上海：澹园，1928），卷一前。

③⑦叶启倬、叶启纂：《〈观古堂藏书目〉跋》，见叶德辉《观古堂藏书目》，简称《观目》（长沙：叶氏观古堂，1905），卷四后。

④⑥叶德辉：《〈观古堂藏书目〉序》，见《观目》，卷一前。

⑤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页38。

⑧昌彼得：《中国目录学的源流》，《版本目录学论丛（二）》（台北：学海出版社，1977），页171，言“我国（笔者按：即中国）目录学，是详分类例以部次群书，而推阐各书之大旨，辨学术的源流本末，志版本的异同优劣，俾使读者依类目以知学术，因学而知求书，求书知道选择版本的一种专门学术。故目录学的主要对象是学术界，不仅是消极的便利查检图书，并能积极地指导学者如何去研究找资料，这与西洋目录学在基本上似有不同之处。”其中所言“推阐各书之大旨”即叙录，“辨学术的源流本末”即小序，“志版本的异同优劣”即版本题识，此三项乃中国编目学所特有的体例。

⑨昌彼得：《中国目录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页37。

⑩祁承炏在《庚申整书例略》，见袁咏秋、曾季光主编《中国历代图书著录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页321—322。

⑪《观目》卷一，页1上。

⑫《观目》卷三，页17上。

- ⑬《郎志》卷四，跋原刻初印本《书目答问》不分卷又一部，页34后—35。
- ⑭《观目》卷四，页27上。
- ⑮同上，页26下。
- ⑯谢国桢：《丛书刊刻源流考》，见谢著《明清笔记谈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226。
- ⑰《观目》卷二，页12下。
- ⑱同上，页16下—17上。
- ⑲同上，页17上。
- ⑳同上，页19上。
- ㉑㉒同上，页20上。
- ㉓《观目》卷三，页56上。
- ㉔同⑨，页37—38。
- ㉕余嘉锡：《目录学发微》（成都：巴蜀书社，1991），页27—29。
- ㉖同⑨，页41。
- ㉗同上，页41—42。
- ㉘同⑨，页47。
- ㉙《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5），卷首，〈凡例〉，页18。

作者工作单位：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